

美国公司税改革动因、可行性及影响研究^①

宋湘燕 胡海涛

(中国人民银行美洲代表处, 纽约 10036)

摘要:2017年4月26日, 美国白宫公布了公司税改革计划的主要原则和基本框架, 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税改。方案包括将公司所得税税率从当前的35%降至15%, 取消公司替代性最低税, 对美国公司留存海外的利润给予一次性征税等。目前, 美国公司税改革计划的核心内容和具体细节尚未达成广泛共识, 势必会有重大修改和完善,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前有望正式出台。此次美国公司税改革将对美企利润汇出、我国境内赴美投资等跨境资金流动产生重大影响。为此, 本文分析了此次美国公司税改革的动因、可行性及相关影响, 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公司税; 改革; 可行性; 跨境资金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53(2017)02-0081-12

一、引言

近年来, 美国公司税改革一直是美国政府与国会两党密切关注且争论不休的一个焦点问题。期间, 围绕这一主题各方均提出过不同版本的计划和方案。如2016年6月24日, 国会众议院议长Paul Ryan和筹款委员会主席Kevin Brady提出名为“更好的路径”(a better way)^②的税改计划蓝图。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 特朗普提出包括大幅削减公司税、给予美国公司海外利润一次性征税优惠措施吸引资金回流等内容的竞选版税改方案。美国政府如此高度重视公司税改革且寄予厚望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背景。

收稿日期: 2017-06-10

作者简介:宋湘燕, 中国人民银行美洲代表处首席代表。电子邮箱: newyork@pbc.gov.cn; 胡海涛, 中国人民银行美洲代表处, 助理研究员。电子邮箱: adamhai2018@163.com。

^①本文主要针对变动幅度较大且对国际税收和跨境资金流动影响显著的美国公司所得税改革进行探讨, 个税改革不是本文关注重点。

^②A better Way Our Vision for a Confident America—Tax, June 24, 2016

二、美国公司税改革的背景

(一) 美国自1996年以来一直维持35%的高税率不变, 严重削弱其税收竞争力

自1996年以来, 大多数世界主要国家陆续开展了公司税改革。G8国家^①中除法国外, 大部分都对公司所得税进行了大幅削减。如意大利将公司税从1996年的53.2%降至2016年的31.4%, 德国从1996年的55.9%降至2016年的30.2%, 加拿大从1996年的42.9%降至2016年的26.8%, 英国将公司所得税率从1996年的33%降至2016年的20%等, 但唯独美国例外, 近20年一直保持35%的高税率未变, 严重削弱了其税收的国际竞争力。智库Tax Foundation调查^②显示, 近三年, 美国在35个国家国际税收竞争力指数排名中, 总体得分排名一直徘徊在倒数几名。其中, 2016年总体得分排名第31, 公司税排名垫底^③。

表1 1986年以来部分主要国家公司所得税演变历程(百分比)

Country	1986	1996	2006	2016
Australia	49.0	36.0	30.0	30.0
Austria	55.0	34.0	25.0	25.0
Canada	49.8	42.9	33.9	26.8
Cyprus	42.5	25.0	10.0	12.5
Estonia	35.0	26.0	23.0	20.0
Finland	51.5	28.0	26.0	20.0
France	45.0	36.7	34.4	34.4
Germany	60.0	55.9	38.9	30.2
Ireland	50.0	36.0	12.5	12.5
Italy	46.4	53.2	33.0	31.4
Japan	50.0	50.0	39.5	30.0
Luxembourg	46.5	40.3	29.6	29.2
Netherlands	42.0	35.0	30.0	25.0
Spain	35.0	35.0	35.0	25.0
Sweden	56.6	28.0	28.0	22.0
Switzerland	31.7	28.5	21.3	21.1
Turkey	46.0	44.0	20.0	20.0
United Kingdom	35.0	33.0	30.0	20.0
United States	48.0	35.0	35.0	35.0

Source: Tax administration authorities or revenue agencies of the corresponding count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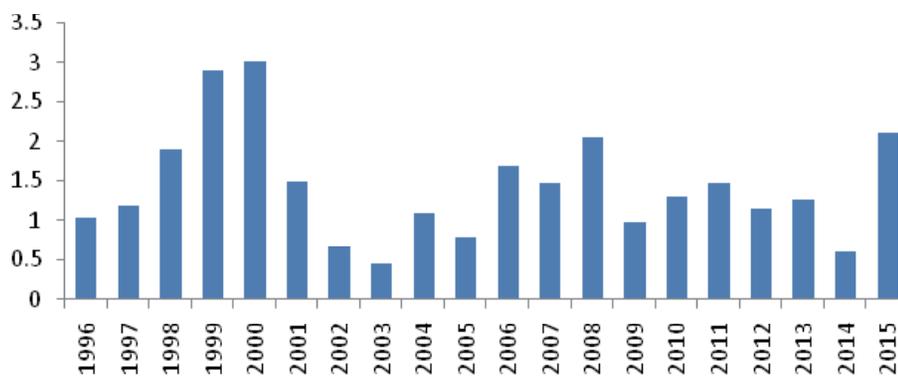
①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和美国

②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veness Index 2016, Tax Foundation

③详见附件1

(二) 高税率既阻碍了境外资金赴美直接投资，也导致美企巨额利润常年滞留海外

实证研究显示，税收政策是除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和汇率以外，影响吸收境外直接投资的另一个核心因素。2001年以来，境外对美国直接投资占美国GDP的比例除2008和2015年个别年份以外一直处于低位徘徊。同时，过高的公司税使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常年将巨额利润滞留海外。根据美国税务联合委员会统计^①，截至2016年，美国财富500强企业通过将海外利润以长期再投资形式截留在境外的资金达2.6万亿美元，规避了近0.5万亿美元的联邦所得税，既削弱了税基，也不利于资金回流促进美国境内投资和制造业发展。



sourc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图1 1996年至2015年境外对美国直接投资占GDP比重

在此背景下，2017年4月26日，美国白宫发布了号称自1986年以来减税规模最大的税改计划纲要。其中，将公司所得税税率从当前的35%降至15%；对美国企业留存海外的利润一次性征税，但未明确具体税率标准；取消公司替代性最低税，以及推动属地制征税原则等。但计划中未提及边境调节税。至此，特朗普政府医改受阻后，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美国公司税改革计划正式揭开面纱。

此次美国公司税改革核心是让客户税更具国际竞争力，吸引美国企业将常年盘踞海外的巨额利润投回美国带动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官员在税改计划发布后表示，公司税改革内容可能会有调整，但公司税改革原则不容商榷，对于可能给财政赤字带来的压力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降低税收抵扣以及堵住税收漏洞来抵消。

^① Letter to House Ways and Means Chairman Brady and Ranking Member Neal from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September 29, 2016

表2 2016年以来美国公司税改革方案演变过程

	所涉条款	现行税制	“税改蓝图”	竞选税改方案	正式公布方案
国内税制	C型公司所得税	35%	20%	15%	15%
	“税赋转由合伙人缴纳”公司所得税	所得直接归属所有者个人,并按照个人所得税率纳税	按现行税法规定征税,最高税率为25%	15%;此外该类型公司的利润分配可能按照股息红利再次纳税	政府发言人称中小型“税赋转由合伙人缴纳”,公司税率为15%
	替代性最低限额税(AMT)	对应纳税额低于最低纳税限额的部分征税。对个人、财产和信托最高AMT税率为28%;对企业AMT税率为20%	取消替代性最低限额税	取消替代性最低限额税	取消替代性最低限额税
跨境税制	境外利润汇回税	没有规定。此前未完税的境外利润在汇回美国后应缴纳35%的企业所得税	美企境外未完税所得如是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在汇回时应按照8.75%的税率缴纳利润汇回税;如是非现金形式的资产,则适用3.5%的税率,上述税款可在8年内分期缴纳	美国企业应就境外未完税所得一次缴纳10%的利润汇回税,上述税款可在10年内分期缴纳	美国企业应就境外未完税所得一次性缴纳利润汇回税,但税率未定
	整体所得税制	全球征税制,同时境外税收抵免制度用以消除双重征税	属地征税制,美企从境外取得的股息红利免征所得税	没有提及	属地征税制
	边境调节税	没有规定	基于交易目的地或消费地来判断是否征企业所得税	没有提及	没有提及

三、此次美国公司税改革的可行性

此次美国公司税改革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一次性减税幅度较大,将公司税单次削减20个百分点,从35%陡降至15%,且未安排过渡期或缓冲期;二是未提及增加税收的“开源”项目,纲要内容以减税为主,削减的税收抵扣也较为有限。这一方面凸显出特朗普政府依靠公司税改革刺激经济增长+促进海外资金回流+降低税收抵扣+堵塞税收漏洞为财政缺口买单,实现公司税改革“自给自足”的改革思路;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特朗普政府此次公司税改革的一个重要前提假设,即公司税改革将刺激经济高速增长,带动财政收入增加,对冲税收减少造成的财政缺口和债务负担。但这种公司税改革模式和前提假设缺乏可行性,也不具备现实基础;尤其在公司税改革计划本身存在明显避税漏洞,政府又缺乏有效管控手段的情况下,公司税改革法案通过国会付诸实施的前景更加渺茫。

(一)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税改经验看,美国此次一次性大幅减税20个百分点且不增加其他增税项目属罕见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近期研究显示:近三十年当中,世界主要国家80%的公司税改革一次性减税都在10个百分点以下,平均约为8.75个百分点;大幅税改平均用时在3年以上,且多为分阶段逐步实施。如英国将耗时14年(2007-2020)才能完成公司税从30%削减到17%;加拿大和德国均分三次分步实施税改,各耗时16年和3年,累计减税25.1和27.3个百分点。同时,大多数税改国家都通过其他增税项目及取消税收优惠来弥补税收缺口。如瑞士1990年将公司所得税从56.6%大幅削减26.6个百分点至30%。当时估计此举将减少GDP6%-7%的税收收入。对此,瑞士政府通过提高对资本收益和房地产等项目税率,扩大增值税覆盖范围至之前免征或少征的货物和服务项目,对冲大幅削减公司税的影响,实现税收平衡。新西兰政府1987年将公司税从48%降至33%,但同时征收类似增值税的一般性服务税,公司税收入占GDP比重5年后从2.1%增长至2.6%,10年后增至4.1%。

表3 1986年以来部分主要发达国家公司所得税改革历程

国家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起始税率	结束税率	CIT变化幅度
Australia	1987	1988	49.00%	39.00%	-10.0
Australia	1992	1993	39.00%	33.00%	-6.0
Australia	1999	2001	36.00%	30.00%	-6.0
Canada	1986	1988	49.80%	41.30%	-8.5
Canada	1999	2005	42.90%	34.20%	-8.7
Canada	2007	2012	34.00%	26.10%	-7.9
France	1987	1988	45.00%	42.00%	-3.0
France	1991	1993	42.00%	33.30%	-8.7
France	1998	2002	41.70%	35.40%	-6.3
Germany	1989	1990	60.00%	54.50%	-5.5
Germany	2000	2001	52.00%	38.90%	-13.1
Germany	2007	2008	38.90%	30.20%	-8.7
Italy	1997	1998	53.20%	37.00%	-16.2
Italy	2002	2004	36.00%	33.00%	-3.0
Japan	1997	1999	50.00%	40.90%	-9.1
Japan	2014	2016	37.00%	30.00%	-7.0
Sweden	1990	1991	56.60%	30.00%	-26.6
Sweden	2012	2013	26.30%	22.00%	-4.3
United Kingdom	1996	1999	33.00%	30.00%	-3.0
United Kingdom	2007	2020	30.00%	17.00%	-13.0
United States	1986	1987	48.00%	34.00%	-14.0

Source: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data, www.doingbusiness.org

(二)从美国税改历史及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看,当前不具备里根时期大幅减税的基础,未来经济预测增速也难以实现税收“自给自足”

1981年里根上台后,推崇以“拉弗曲线”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主张,先后通过1981年的大幅减税和1986年的“中性税改”两次重要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刺激经济增长。但目前,美国宏观层面尚未出现与里根时期信息技术革命相比拟的科技革命,外部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债务达到1945年之后高峰,财政支出压缩空间极为有限,特朗普政府面临更多现实约束,不具备里根时期大幅减税的基础。此外,根据联邦预算尽责委员会估算^①,如靠公司税改革刺激经济高速增长来平衡税改带来的财政赤字,美国需要保持4.5%以上的GDP年均增速。可从长期来看,一国经济增速无法超越劳动力人口和单位产出两项增速之合。过去十年,美国25~54岁的黄金年龄段人口年均仅增长0.1%^②,同时,2010年以来,美国非农部门工人单位产出年均增长只有0.7%。包括美联储官员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预测美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速是这两项增速之合,即只有1.8%^③;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的美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速也仅为1.9%^④。可见,未来美国经济增速难以支撑如此大幅的税率削减。

(三)公司税改革计划缺少“开源”项目,无法填平补齐税收缺口,加大财政收入压力

据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计算^⑤,税收每降1个百分点,将使美国财政收入10年内减少1000亿美元,降低20个百分点,就意味着10年内要削减政府收入2万亿美元。另据联邦预算尽责委员会估算^⑥,特朗普税改未来十年的财政成本至少为3万亿美元,最高将达到7万亿美元,基准估计为5.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GDP的20%。在之前提出的边境调节税下,美国将对进口货物课税20%,对出口商品免除该项税收。美国税务基金会估算,20%的进口税将在未来10年给美国政府创造共计1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这能在很大程度上填补削减企业所得税带来的财政缺口。但此次公司税改革纲要没有提及任何包括边境调节税在内的增税项目,在公司税改革刺激经济增长存在明显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靠降低部分税收抵扣难以填平补齐税收缺口,将显著加大财政收入压力。

(四)法定财政支出逐渐增加,未来面临更多刚性支出需求,难以靠“节流”支撑税改

近20年来,美国财政支出中,国防和非国防等自主性支出占比呈现下降趋势,社保、医保、医疗补助等法定支出占比逐渐上升。如今,婴儿潮一代已全面开始退休,将进一步增加政府社保和医保等法定支出,而特朗普政府还计划增加国防军费开支和修筑美墨边境墙等,因此,未来美国不但缺少缩减政府财政开支的空间,相反,将面临更大规模的刚性财政支出需求。根据布鲁金斯研究院分析,即使美国经济始终接近充分就业,不参与新的战争,也不进行重大税收或支出改

①<http://www.crfb.org/blogs/how-much-will-trumps-tax-plan-cost>

②<https://www.wsj.com/articles/labor-force-stands-in-way-of-trumps-3-growth-goal-1494861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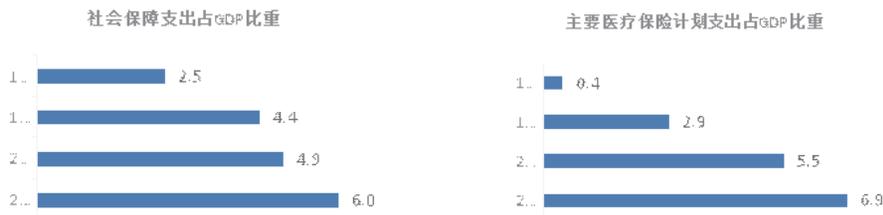
③美联储官员预计未来十年,美国年均经济增速为1.8%,其中,劳动力年均增速为0.5%,人均产出年均增长为1.3%。

④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of:2017-2027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⑤<https://www.wsj.com/articles/trump-wants-tax-plan-to-cut-corporate-rate-to-15-1493057898>

⑥<http://time.com/4756442/trump-tax-reform-plan-mnuchin/>

革，到2026年债务仍将增至GDP的93%，2046年将达到150%。此外，美国已进入加息周期，根据美联储以往做法，美国可能迎来连续加息，届时将导致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大幅增加，使已经高企的债务负担雪上加霜。可见，美国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均并不具备靠“节流”支撑税改的基础。



Sourc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图2 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

图3 主要医疗保险计划支出占GDP比重

(五) 新公司税与新个税税差过大，存在巨大避税空间，进一步加剧公司税改革难度

美国公司税改革提出将公司税由35%降至15%，个税由39.6%降至35%，由于改革后两项税率相差悬殊，将刺激部分公司削减员工工资，转为通过公司利润或红利方式支付，规避较高的个人所得税。同时，政府发言人称，中小型“税赋转由合伙人缴纳”公司也享受15%的新公司税率，此举将进一步加剧税收流失。据布鲁金斯研究院统计^①，2014年，美国2600万个公司当中，95%是“税赋转由合伙人缴纳”型公司，只有5%是C型公司（即适用目前35%公司税的企业）。“税赋转由合伙人缴纳”公司本身不需要交纳公司所得税，利润转由公司所有者个人按个税标准进行缴纳。在上述税差的刺激下，规避个税的情况势必将更加普遍。而相对于公司所得税来说，个税是美国财政收入来源的更重要组成部分，近二十年占比一直超五成以上。据Tax Policy Center统计^②，2015年美国公司税收入占GDP的1.9%，个税收入占8.7%，大规模逃避个税行为将显著增加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剧公司税改革法案的通过和实施难度。

此外，布鲁金斯研究院撰文称，特朗普政府寄希望于靠削减公司税和给予海外存量资金一次性汇回优惠税率以吸引大量回流来弥补大幅减税所造成的财政收入缺口，这种用“一时”的资金回流来抵消长期税收损失的想法极不现实。在公司税改革初期，也许可能实现财政收支相对平衡，但由于资金回流不可持续，后续将面临严重赤字和债务压力。

四、现有方案可能出现的调整及出台时间的预判

综上，美国公司税改革虽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在未来经济发展明显难以达到政府预期的高

^①9 facts about pass-through businesses, Aaron Krupkin and Adam Looney Monday, May 15, 2017

^②Sourc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Historical Tables, Table 2.3; <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Historicals/> (Last accessed February 15,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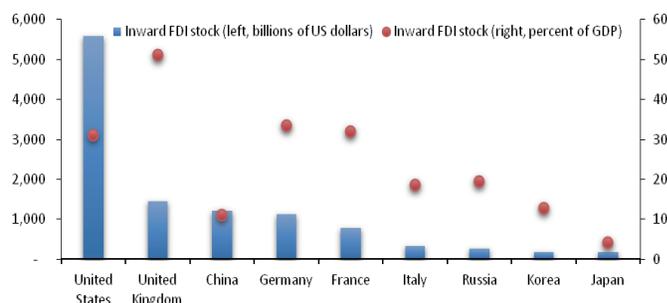
增速，公司税改革计划既不“开源”，财政支出又无法大幅“节流”，公司税改革内容还存在明显漏洞的情况下，不经过一定调整，相关法案很难通过国会付诸实施。结合世界主要国家税改经验和现实情况看，美国税改方案可能会有以下几方面调整：一是增加类似边境调节税的增税项目，或进一步大幅削减现有税收优惠和抵扣项目，为公司税改革提供财政支撑，向税收中性靠近；二是公司税的削减幅度可能改为从35%降至20%。一方面，平衡公司税与个税之间的税差，降低对规避的刺激和税源的影响；另一方面，减轻赤字压力，向财政中性靠近，便于法案通过和实施；三是为刺激美企海外利润回流，帮助政府在公司税改革初期实现中性税改，给予海外资金汇回一次性征税税率可能低于特朗普竞选时宣称的10%，并对汇回资金用途进行限定，2014年小布什曾经给予海外资金汇回一次性征税5.4%；四是如果保持大部分现有公司税改革计划内容不变，则可能增加适当的过度期或缓冲期，如像其他国家通过2~3年时间分步实施税改。

预计经过调整的公司税改革法案可能会在年底或明年初推出，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前有望正式出台。近期，特朗普继“通俄门”后又爆出“泄密门”事件，引发媒体关于对其进行弹劾的热议，政治威信严重受挫，执政能力备受质疑，各界普遍担心税改法案可能无法如期推出。虽然目前“泄密门”事件如何演进尚不明朗，但通过分析美国公司税改革的必要性可以看出，无论该事件最终如何发展，最多只会推迟税改的时间，不会改变公司税改革的方向。鉴于上述情况，预计经过调整的美国公司税改革法案可能会在年底或明年初推出。目前，虽然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但公司税改革法案能否在共和党内部达成一致尚且存疑，所以能否顺利通过国会的审议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估计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前有望正式出台。

五、未来公司税改革实施的潜在影响分析

（一）对美国自身的影响

一是吸引境外直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但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如图4所示，当前较高的税率下，美国已经是世界上吸收境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因此，美国即便只将现行公司税率削减10~15个百分点，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吸力都将大幅增加。



source: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6

图4 2015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境外直接投资流入 金额及占比GDP (单位: 10亿美元)

如彼得森经济研究所通过分析历年相关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所得税每降低1个百分点,将增加年度境外对美直接投资3.2个百分点。近年来,境外对美直接投资流入年均占GDP1.3%。如按照众议院议长瑞恩提出的公司税改革蓝图计划中将公司所得税降为20%计算,可增加境外对美国直接投资35.5个百分点^①,带动GDP增速上涨0.5%;如果像公司税改革计划中所言将公司税降至15%,那么对美国经济的刺激作用将更明显。但与此同时,彼得森经济研究所在该报告中也指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一直维持非常低的利率,大型企业可以低于4%的利率进行长期(50年或者更长)融资,但即便如此低的长期利率也并没有刺激投资大幅增长。同理,低税率未必一定会刺激美国国内投资或FDI大规模流入。同时,按照历史经验,美国大幅减税后,其他国家恐将相继进行税改,届时国际间税差将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公司税改革对FDI的吸力有可能会打折扣。

二是促进海外资金回流,短期效果将比较明显。如前所述,美国公司在海外利润目前已经超过2.5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14%。一方面,如果美国将公司所得税从当前的35%削减到20%~25%,那么只是接近于发达国家23%的平均水平,由于税率仍明显高于保加利亚(10.0%)、塞浦路斯(12.5%)、爱尔兰(12.5%)和波兰(19.0%)等国,对海外资金的吸力将比较有限;若美国公司税改革将公司税直接降至15%,将明显低于绝大多数主要国家公司税率,效果也将立竿见影,但这种可能性极小。另一方面,鉴于2004年小布什对美国海外资金一次性征税5.4%,也只是让30%左右资金回流,此次公司税改革极有可能对海外资金给予低于10%的一次性汇回税,届时将对长期盘踞海外规避美国高税收的存量资金起到很强的吸力。同时,考虑到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增速下降、资金外流等问题,而美国经济已率先企稳复苏,相关预期会一定程度上放大一次性征税的税收优惠作用。另外,此次公司税改革提出将公司税的全球税制改为属地制,今后美企海外利润可能免于征收所得税,将增加资金回流的持续性。

三是推动美元进一步走强,出现一定幅度升值。大量境外直接投资流入和国内投资增加将推高美元汇率并扩大贸易逆差,从而会一定程度上平抑FDI流入带来的积极作用。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伯斯法尔德指出,美国公司税改革将支撑美元升值,从而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波及其他国家。高盛集团经济学家David Mericle在一份研报中称,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税制改革能够兑现,比如将法定企业税率降至20%,那么美元可能需要升值25%。摩根士丹利表示难以准确估算美元的升值幅度,他们认为减税可能会让美元升值10%~15%;如果汇率市场对减税的反应顺利传导下去,那么美元可能最终升值25%,但概率较小。德意志银行认为,如果美国公司税改革付诸实施,将对美元带来极大利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也将因此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四是财政赤字压力显著增加,债务大幅攀升,挤压基建等其他重大支出项目的实施空间。如前所述,根据Tax Policy Center等多家机构测算,此次美国公司税改革计划将在未来10年将给联邦政府增加3~7万亿美元左右的成本,美国的财政赤字将扩大到逾1万亿美元,美国债务占比GDP峰

^①目前美企平均实际公司税率为31.1%。

值也将由先前预估的89%大幅抬升到111%。同时,虽然美国财长曾表示不会将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法案整合入税改中,不希望通过增加公共债务来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将主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进行融资,但政府仍需要投入一定规模的资金,税改的实施将一定程度挤压基建等其他重大支出项目的实施空间。

(二) 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

一是掀起国际税务战。减税的影响具有国际化,大量的资金和生产要素会流入税率较低的国家,这将迫使其他国家仿效相同做法以减少国家间的税收差异。以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减税为例,其减税方案刚出台,一些国家便纷纷效仿。包括德国、日本和法国均提出降低所得税的法案。如果此次特朗普减税政策得以实施,作为应对措施,一些有实力的国家会相继加入这场战争,或竞相减税,或以邻为壑,或设立避税天堂,不仅会使国际税收秩序陷入混乱,更会使业已形成的G20等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框架下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等反国际税收恶性竞争成果缩水,此外,还将使部分无力搞税收竞争的出口导向型国家直接受损。

二是加大发展中国家资金流出压力。2004年小布什给予美国海外资金一次性优惠征税时,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基本都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对资金吸力较大,抵御相关影响的能力较强。目前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增速下降、资金外流等问题,在美国步入加息通道,美联储缩表渐行渐近,美元流动性愈加紧张背景下,美国公司税改革将对资金流出发展中国家起到明显的推波助澜作用,进一步加大发展中国家资金流出压力。

为此,我们应密切关注美国公司税改革动向,深入分析、科学谋划、妥善应对。一方面,可适度通过进一步降税降费激发经济活力,以防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另一方面,应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增强对资金的吸力和拉力,平衡外部影响。

参考文献

- [1] GARY CLYDE HUFBAUER, ZHIYAO LU. Lessons for US Business Tax Reform from International Tax Rates [J/OL PB17-2].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 [2] AARON KRUPKIN, ADAM LOONEY. 9 Facts About Pass-Through Businesses [J/OL].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5th May, 2017.
- [3] SIMEON DJANKOV. Corporate Tax Cuts: Examining the Record in Other Countries [J/OL 17-14].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 [4] JASON FURMAN. What Ten Million Simulations Tell Us about President Trump's Chances of Achieving 3-Percent Economic Growth [J/OL].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 [5] ADAM LOONEY. 4 Reasons Trump's tax plan is a Tougher Sell than Trumpcare [J/OL].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7th April, 2017.

附件1 2016 国际税收竞争力指数排名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veness Index Rankings

国家	总体得分	总体排名	公司税排名	消费税排名	财产税排名	个税排名
Estoni	100.0	1	1	10	1	2
New Zealand	91.6	2	21	6	2	1
Latvia	88.0	3	2	25	6	7
Awitzerland	84.6	4	7	1	33	4
Sweden	82.1	5	6	11	7	23
Netherlands	81.4	6	17	12	23	5
Luxembourg	78.6	7	31	5	18	13
Australia	78.3	8	26	8	4	15
SlovakRepublic	75.0	9	11	32	5	8
Turkey	74.8	10	10	26	9	3
Norway	70.9	11	12	22	16	11
Korea	70.0	12	20	3	26	6
CzechRepublic	70.0	13	8	31	10	12
Ireland	70.0	14	3	24	17	24
Slovenia	69.7	15	4	27	15	14
UnitedKingdom	69.6	16	19	17	31	17
Australia	69.6	17	18	23	8	33
Finland	68.4	18	5	14	19	27
Canada	68.3	19	22	7	22	21
Denmark	67.4	20	23	13	14	32
Germany	66.3	21	14	19	12	29
Iceland	66.3	22	13	21	21	30
Hungary	64.3	23	15	35	25	20
Mexico	62.7	24	28	20	3	9
Japan	61.4	25	34	2	27	28
Belgium	60.7	26	25	9	11	26
Israel	59.5	27	27	15	32	19
Spain	58.9	28	29	30	24	10
Poland	56.5	29	9	34	29	16
Chile	55.7	30	16	29	13	18
United States	53.7	31	35	4	30	25
Greece	52.7	32	24	28	28	22
Portugal	50.9	33	30	33	20	31
Italy	46.1	34	33	18	34	34
France	43.2	35	32	16	35	35

Sources: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veness Index 2016, Tax Foundation

Study on Causes, Feasibility and Effects of US Corporate Tax Reform

Song Xiangyan Hu Haitao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meric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Abstract: On 26th April 2017, the white house unveile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framework for the American tax reform which it called the biggest tax cuts and the most significant tax reform since the 1980s of Reagan era, which would slash U S corporate tax rates from 35% to 15%, and cut the alternative minimum tax (AMT), as well as give an one-time income tax on profits of U S overseas companies. There is no consensus reached on the kernel details of the tax reform plan at present, which is doomed to undergo large scale adjustments and modifications, and will hopefully promulgate and implement before the midterm elections in 2018. American tax reform will exert great influence on outward remittance of dividends of U S firms in China, as well as on cross border flow of funds triggered by increased Chinese firms investing in U 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causes, feasibility and effects of the tax reform, and put forward the recommendations accordingly.

Key words: Corporate Tax; Reform; Feasibility; Cross-border Flow of Funds

(责任编辑: 王丽纳)